



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

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

刘炯忠 叶险明 著



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

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

刘炯忠 叶险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马克思生产力观的历史思考	7
第一章 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力理论	7
一、思想渊源与社会历史前提	8
二、近代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的“功”与“过”	15
第二章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36
一、理清探索的方法论头绪	36
二、从马克思唯物史观发展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谈起	42
三、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	44
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发展的逻辑过程	48
五、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时代感”	63
第二篇 马克思生产力观研究中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73
第三章 生产力本质的分析	73
一、生产力的本质首先是实体的、物质的	73
二、关于科学本质的思考	92
三、从生产力的本质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自觉活动	127
第四章 生产力要素的方法论探讨	140

一、从方法论看生产力概念的分类·····	140
二、对生产力中物的要素的简析·····	153
三、对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的简析·····	173
第五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	186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186
二、从生产力标准看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 规律及其重大意义·····	205
三、生产力与政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关系·····	221
第六章 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源泉·····	235
一、对动机与动力的分析·····	235
二、从唯物主义角度看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源泉··	248
三、从辩证法角度看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源泉····	275
第七章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质·····	303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303
二、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	306
三、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 展·····	313
四、方法论意义·····	320

第三篇 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对现代社会走向的社会主义思考····· 323

第八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的国际性和民 族性·····	323
一、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时代发展阶段的不 可超越性·····	324
二、生产的民族内部关系与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 可超越性·····	342
三、生产的民族间关系与“跨越”的具体规定·····	350

第九章 生产力的属性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	357
一、生产力的属性与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物质变换关系	357
二、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物质变换关系演变的生产力基础	362
三、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	368
第十章 科学的生产力观与社会发展图式	372
一、“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的历史规定性	372
二、科学的生产力观与唯物史观的两大“理论构架”	378
三、科学的生产力观与“两论”的方法论功能	382
四、科学的生产力观与马克思探视社会发展的逻辑框架	387
第十一章 历史决定论与当代不同发展道路选择的生产力基础	392
一、以科学的生产力观为基础的历史决定论	393
二、当代社会主义选择的生产力基础	396
三、两种不同发展道路选择的生产力基础	402
 第四篇 科技革命社会作用论与对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的批判	411
第十二章 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科学的社会功能	411
一、科学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规定性	411
二、关于科学本性的问题	421
三、科学与整个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定性	425
第十三章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432
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	

运动·····	432
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会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导向·····	442
三、处于现代科技革命大潮中的“两种生命力”·····	448
第十四章 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学说的生产力观·····	453
一、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学说的生产力观由以形成的方法论前提·····	453
二、“工业社会理论”·····	460
三、“后工业社会理论”·····	464
四、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学说的生产力观的几点方法论思考·····	471
第十五章 比较研究方法与对“趋同论”生产力观的批判·····	479
一、“趋同论”的思维构形及其由以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480
二、肤浅的比较与被扭曲的“生产力”·····	485
三、社会经济形态比较与社会经济体制比较·····	495

前 言

历史的急骤变化，往往把人们理论思维的视野引向历史的纵深层次。

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全球涌动的改革浪潮，风云变化的国际社会，再一次显出马克思生产力观令人瞩目的时代感。马克思的生产力观是哲学社会科学结构的深层基础，也是人们立足于历史纵深层次，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主动脉的基础。只有凭借这一基础，人们才能从历史的纵深层次上全面探视把历史表层变化万千的现象联为一体的主构架，从而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导向。

可以说，近十几年来，对马克思生产力观的研究，我国学术界独领风骚、成果累累。不过，其局限性也比较明显。首先，缺乏对马克思生产力观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前提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考察；其次，不能把对马克思生产力观的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历史观研究从方法论上有机地统一起来；再则，不够重视对马克思生产力观的应用方法的探讨，特别不够重视结合对当代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分析来探讨马克思生产力观的应用方法。上述局限性使对马克思生产力观的研究难以全面地提高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我们选择“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这个课题，就是为了克服上述局限性。

“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是一个难度相当大，涉及面又十分广泛的重大社会历史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是一个空白。因此，在对这一课题进行系统研究方

面走出一条路子，是我们这几年来的追求。

为了使人们对本书的逻辑构思及写作目的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此，有必要对我们系统考察上述重大社会历史课题的方法论原则做一简要说明。因为，考察问题的方法论原则直接规定着表述考察结果的逻辑思路。

第一，理论的历史、理论和现实的历史有机统一的原则。这既是系统考察“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所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也是系统阐述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课题考察成果所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全书分为四篇：“马克思生产力观的历史思考”、“马克思生产力观研究中的若干方法论问题”、“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对现代社会走向的社会主义思考”、“科技革命社会作用论与对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的批判”。虽然这种分篇法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本书的每一篇章都力图体现理论的历史、理论和现实的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但各篇的重点则是应当确定下来的：第一篇侧重于生产力观历史发展逻辑的探讨，第二篇侧重于马克思生产力观的方法论考察，第三、四篇侧重于正确、全面地用马克思的生产力观来指导当代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考察的方法的研究。

我们认为，只有依据理论的历史、理论和现实的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谋篇布局，才能突出对“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进行系统考察的主旨：全面阐述马克思生产力观的现代意义，在对当代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研讨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力观。

第二，把对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潮的批判、理论上的创新与对现实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回答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其中任何一方都会被人为地扭曲。因此，本书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上，选择了难度大、现实所提出来迫切需要回答、直接涉及对“马克思的生产力

观与现时代”的总体上的正确把握的，且又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或分歧较大、容易被错误思潮“钻空子”的问题加以探讨。其中包括：近代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的功与过，生产力观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的生产力观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质实体性，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与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动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系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的国际性和民族性，对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再认识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必然性与当代不同发展道路选择的生产力基础，科学的社会功能与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机制和条件，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批判，等等。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上述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生产力观的突破点。

第三，正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正确、全面地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观，是有机统一的。目前学术界有些人虽然对马克思生产力观的一些具体理论本身的理解并没有什么偏差，然而一旦把它们运用于当代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考察，却往往得出与马克思生产力观的精神实质相悖的结论。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脱离马克思生产力观的整体来把握马克思生产力观的某一论点，同时又脱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整体来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观。我们认为，能否正确、全面地运用马克思生产力观是衡量能否正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生产力观的一个重要尺度。因为，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决定了，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观必然会直接涉及对它的各个构成环节之间关系以及它同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论之间关系的把握。

所以，在方法论上，本书注重贯彻正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正确、全面地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观相统一的原

则。例如，在第一篇中，我们试图从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来把握科学的生产力观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第二篇中，我们把马克思生产力观的各个理论环节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有机体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过程中来考察；在第三、四篇中，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上探讨了关于正确、全面地用马克思的生产力观来指导当代重大现实历史问题考察的方法论。

第四，马克思生产力观是革命观与建设观的有机统一。我们不同意学术界有些人所持的一种观点：马克思的生产力观只是革命观，而不是建设观，因为，它只是把生产力作为既定的社会物质力量来考察，而没有涉及到如何发展生产力或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问题。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就在于：忽略了革命观与建设观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生产观的内在逻辑要求。首先，从社会的静态结构的角度上看，生产力是既定的、根本性的社会物质力量，然而一旦把时间序列引入社会结构的考察，就必然要论及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问题，否则就无法从动态关系的角度上说明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深层基础作用。其次，马克思的生产力观集中地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的科学考察中，其中包括他对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如何发展的问题的系统探讨。这一探讨所具有的一般方法论意义，给予面临着发展生产力任务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许多深刻的启迪。最后，马克思生产力观的主旨是为人类指明全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因此，马克思的生产力观是与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中，就包含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科学的生产力观既是革命观又是建设观。本书将通过“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的系统考察，全面地印证这一点。

当然，从革命观与建设观有机统一的角度上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观，并不能代替我们对当代（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探索，但是，全面、深入地挖掘马克思生产力观的丰富宝藏，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它的革命功能和建设功能，这一点应当是无疑的。

第五，必须把对近代、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的批判性研究，作为对“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系统考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对近代、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的批判性研究，在本书中占有一定的篇幅，我们之所以如此安排，主要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首先，迄今为止，由于缺乏对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的批判性研究，以及对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的比较性研究，致使对马克思生产力观的现代意义的系统考察很难深入下去；其次，目前学术界有些人在对当代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考察时，往往不自觉地把马克思的生产力观混同于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力观；再次，只有通过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的批判性研究，才能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生产力观的科学性和批判性；最后，从逻辑上看，对“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的系统考察，内在地包含着对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的批判性研究，因为，用马克思的生产力观来指导对当代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考察本身就包括：回答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力观的挑战，清理和纠正被它搞乱了的理论问题，并批判地汲取这一学说的合理因素（从而在批判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力观）。

以上我们简述了系统考察“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课题的方法论原则。但愿读者能由此对本书的写作目的、学术价值及其逻辑构思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

《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是

国家教委博士点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书只是我们对这一课题的初步研究成果，故不妥或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作者

第一篇 马克思生产力观 的历史思考

第一章 近代资产阶级 的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块基石。它的形成离不开前人所留下来的特定的思想材料。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思想理论土壤。因此，要完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就不能不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上来考察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力理论。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迅猛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为整个世界孕育出一个经济巨人——产业革命。这个经济巨人由远及近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使立足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思想家们豁然醒悟：人类的各種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当人类一旦清醒地觉察到自己知识体系的薄弱环节，（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关于人及其社会知识体系大厦基础——生产力理论——的尝试便油然而生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涉猎生产力领域，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留下了零乱的、但又富有探索性的足迹。

一、思想渊源与社会历史前提

近代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的产生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人类对生产力的研究开始于近代，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人类的理性思维从未“光顾”过生产力领域。古希腊哲人们的智慧之光就曾从人类社会的这一深层领域掠过。色诺芬是第一个使用“经济”这个术语的人。这个术语的使用直接反映着人类开始将自身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的尝试，而这种尝试又必然使人类的理论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有关生产力的问题，尽管当时人们（包括色诺芬）对这个术语的理解还比较狭隘。色诺芬注重对商业和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货币与财富之间的关系的的研究，特别强调农业生产对其他形式的社会生产和技艺发展的基础作用。他指出：“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①这段论述所包含的思想对法国的重农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魁奈将色诺芬的这段话作为他的代表作《经济表》的题词。柏拉图的职业结构和职业分工理论不自觉地、本能地绘制出了一幅在某些方面接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真理的画面。柏拉图在谈到城邦的需求结构时指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是吃、穿、住，而满足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就要有种粮的农民，建房的工人，织布的织匠，以及为他们制造工具的工匠。除此以外，社会还应有从事于实现产品的流通和交换等种

^① 〔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页。

类的职业。在他看来，社会分工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好途径，它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为社会创造出质量好、数量多的产品。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色诺芬和柏拉图的思想。他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研究有两大贡献：一是几乎猜测到了人类劳动的一般；二是意识到了生产的方式与生活的方式之间的联系，试图用生产的方式去说明生活的方式，虽然这种说明带有明显的阶级偏见。

流行于中世纪的“公平价格论”包含着把生产上的劳动耗费看作价格的基础的合理因素，但它毕竟只是当时的宗教法典学者关于价值的一种解释。在中世纪，“上帝的魔杖”和“沉重的十字架”给人类伸向经济领域的视野设置了层层障碍。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受道德规范的制约，而道德规范又是由上帝规定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把人类经济活动领域涂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学色彩，并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问题划分为两类：“关于在放债中所犯的高利剥削罪恶”和“关于在买和卖中所犯的欺骗恶行”。这样，辐射在人类经济活动领域上的智慧之光就淹没在上帝的灵光圣影中了。

文艺复兴开始摧毁人们自己塑造的、建构于心灵之上的、供奉了千年之久的神的殿堂。在文艺复兴的狂涛巨澜中产生的重商主义，特别是在重商主义流行了200多年后出现的重农主义，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研究又大大地深入了一步。“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在安徒安·德·蒙克莱田的著述中，最早提出“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是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如果说前者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试图将古希腊人关于家庭和城邦的经济活动的学问扩展成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关系）的科学的努力的话，那么，后者则体现了人类理论思维向经济活动领域深层的逼近。当然，魁奈的生产力概念还是很狭隘和片面的，它指的仅是土地。当人们还没有把握住“劳动的一般”时，就不可能把生产力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单位来加以考察。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

古希腊和近代初期以前的思想家们在思想理论上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力理论的产生做了必要的准备。

但是，一种理论的思想渊源还不足说明这种理论由以形成的内在逻辑。凡是在人类思想认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学说的形成，往往是社会经济、政治、精神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变革的酝酿和展开过程的直接产物。近代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的形成也不例外。

19世纪70年代以前，绵延了几十万年的生产力的根本性的飞跃有两个：一是摩擦生火，“它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分开”；二是产业革命，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基本转变”。人的体力的极限是产业革命前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它具有特别保守的性质”，而产业革命则开始展示出人的本质力量的无限性，并使历史愈来愈成为“世界史”。当然，产业革命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产业革命是一个过程。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经济、政治、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无不与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展开过程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因此，只有通过这一内在联系的考察，才能在总体上把握住近代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

1. 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展开过程逐步消除了人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偏见

劳动，在古代的代名词是卑贱，在中世纪的同义语是“赎原罪”。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展开过程逐渐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的范围内最终确立下来，随之，商品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商品所有者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从而劳动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步取得了与其他社会活动相平等的地位，人类平等成为人们的牢固观念（包括对劳动的等一性和等值性的确认）。只有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才有可能使人们用比较公正的眼光去探视社会经济活动，并进而把生产力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单位来加

以考察。

另一方面，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展开过程从三个方面突出了社会经济活动对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作用。

首先，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展开魔力般地推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猛烈地冲击着陈旧的生产关系，在空前短的时间内改变着人们的需求结构、交往关系、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的确，“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①。但是，人们把生产力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单位或明确的研究客体来加以考察，只有在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展开的时期才有可能。在此以前，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它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深层基础作用表现得比较隐晦，通常不能以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突出了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深层基础作用，就可以立刻使人们在科学的理论形态上把握生产力的这种深层基础作用，而是说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深层基础作用以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使人们有可能把生产力作为一个明确的研究客体来考察。从把生产力作为一个明确的研究客体来考察到在理论形态上科学地揭示生产力的“深层基础作用”，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只是经历了其中的量变、甚至是局部性质变阶段，而没有也不可能经历其全局性质变阶段。

其次，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展开的时代，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代。被卷入激烈竞争中的每个生产的个体、生产的集团和生产的民族都从各自的切身利益关系上感觉到：如果不被竞争的浪潮所吞噬，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这种切身利益（或利害）关系迫使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得不把生产力作为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